

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演变历程

——以黄花岗起义纪念为中心

娄亚丽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研究室, 广东 中山 528454)

摘要: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革命过程中一次重要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举行了四次纪念活动。在革命初期,孙中山着重强调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孙中山先生将三民主义与黄花岗起义纪念相联系,赋予黄花岗起义新的内涵。孙中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呈现出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 孙中山; 军事思想; 黄花岗起义纪念

中图分类号: K257; E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6)02-0056-05

The Evolution of Sun Yat-sen Military Thought: Focus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LOU Ya-li

(Research Laboratory, The Museum of Dr. Sun Yat-sen,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54, China)

Abstract: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prisings Sun Yat-sen once led. Headed by Dr. Sun, four commemorations were held for the memory of the 72 Martyrs of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volution, the spirit of gallant sacrifice of the revolutionists was emphasized by Dr. Su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Dr. Sun connect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ith the anniversary of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And so,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was given new meanings. From the commemorations of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we find that Dr. Sun's military thought of Dr. Sun experienced a change.

Key words: Sun Yat-sen; military though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革命党人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广州“三·二九”起义爆发。后因清军戒备森严,原定起义计划被打乱、革命党人内部联络不畅等诸多因素,起义最终失败,同盟会员潘达微及广善仁堂等收集72具烈士遗体,葬在广州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战役。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政府的严密稽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迫于时局所限并未及时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才得以重新纪念此次起义。孙中山终其一生曾先后四次祭奠黄花岗烈士,并亲自为其撰写祭文,可见对黄花岗起义的重视程度。孙中山曾高度评价此次战役,认为“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

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533-534}。

目前学术界对孙中山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军事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孙中山的军政关系理论、海军思想、军事现代化思想、军事教育思想等视角展开。赵洪宝探讨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精神教育的思想及实践^[2]。宗成康关注到孙中山的一地起义、各地响应战略^[3]。彭平一、夏明涛对孙中山的战争观加以梳理,考察孙中山对战争性质、战争目的和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并将此看作是孙中山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吴学文对孙中山与黄花岗起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孙中山祭奠黄花岗烈士是对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重视^[5]。上述专题研究对孙中山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梳理,同时也为梳理孙中山军事思想在不同时期

的历史演变留下一定的空间。以孙中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活动为例,从孙中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活动出发,探究孙中山在不同时期赋予黄花岗起义不同内涵的背后其军事思想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透视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意义。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在革命过程中研究中外军事理论,历经各种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革命初期,孙中山仍然采取招募勇士,联络会党这种传统的起义方式,进行革命斗争。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在革命中后期,孙中山开始注重依靠新军的力量,加强对军队的精神教育,以三民主义思想治理军队,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孙中山军事思想的演变与三民主义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其军事理念也随着三民主义的系统化而逐渐成熟。

一、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为招募勇士、联络会党、注重宣传,共同反抗清朝统治。

早在1881年,年仅15岁的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便十分热衷于学校的军事体操课程^[160]。1893年冬,孙中山首次倡议组织社团,继续物色反清志士,畅谈时政^[167]。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组织华侨兵操队,为归国起义做准备^[176]。1895年3月下旬,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等”^[185]。1900年10月,孙中山总结革命经验时说:“惟当草创之初,百事未备。徒手奋起……,所恃者人心勇敢而已”^[107]。可见,招募勇士是孙中山革命初期倚靠的主要力量之一。

除了招募勇士之外,孙中山也非常注重发挥会党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孙中山看来,“乙酉以后,余所持之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635]。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通过会党联络新军的方式,“主要是联络其中的会党成员,与他们歃血盟誓,换帖拜把,结成兄弟,然后逐步灌输革命思想,并通过他们在新军内部暗中串联,动员更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同情乃至直接参加革命”^[639]。1911年1月,胡汉民向孙中山阐述当时新军的情况:“时广东全省军队万余,惟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得新军则他军无难制驭”^[17487]。1911年

1月中旬,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人在香港设立统筹部,黄兴担任统筹部部长,赵声任副部长、胡汉民任秘书长。统筹部下设八课,分别是调度课、编制课、秘书课、交通课、出纳课、储备课、调查课、总务课。其中调度课职位重要,由姚雨平担任课长,负责运动新、旧军队^[819-20]。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起的最后一次起义。起义前孙中山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可以说是此次起义的间接领导人。在军事组织方面,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开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在此次起义中注重新军的力量。为了发动新军参与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十分注重革命主义宣传工作,而此次黄花岗起义,“则尤于普通宣传之外,特意注意军界,因而有可报之组织”^[819-20]。为募集起义经费,孙中山积极奔走,“1911年2月12日在温哥华开会演讲,受到当地洪门大佬陈文锡等人的欢迎,反应热烈,致公党首捐一万港元,到黄花岗起义爆发,加拿大各埠华侨捐款共七万余港元”^[9]。

黄花岗起义失败,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来重创。但是,孙中山十分赞赏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对黄花岗起义纪念十分重视。

二、“共和”话语下的黄花岗起义纪念和尚武精神的阐发

1912年5月15日是黄花岗起义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率各界人士十余万至黄花岗祭奠悼。先生主祭并致祭文,祭毕于墓前亲手栽种松柏四株”^[1698],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对黄花岗起义进行纪念。与此同时,同盟会总部及其分会也纷纷在各地开展纪念活动,同盟会驻沪支部借英租界浙江路新新舞台开追悼大会,各界人士纷纷参加,与会者达千人。在民国初建的时代背景下,这些纪念活动,受到了强势的“共和”话语影响,黄兴在纪念会上称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全属义务,无权利思想”,马相伯也宣扬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精神^[162]。在“共和”话语影响下,“舆论对黄花岗起义的评价也侧重‘共和’,当时有挽联‘壮君等血泪构成民国,策我辈精神建设共和’。民国作为新诞生的国家昭示着共和时代到来,借助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赋原本失败的武装起义以实现一共和国家的意义”^[1162]。

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在军事上推行崇尚武力的思想。1912年7月1日,孙中山在《复陈其美函》中提出,要建设民主政府,就要改革中国旧

军备,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器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12]。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发布中华革命党革命军之誓约书,孙中山强调军人对领袖的绝对服从,要求中华革命党成员签订誓约书,誓约书中规定,“自受军职以至革命成功之日,誓严守以下约章: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13],表现出鲜明的尚武精神。

1915年,孙中山致函美国旧金山的革命同志,称赞他们虽然侨居海外,但是“不忘尚武精神,心热眼明,感甚佩甚”^{[10]77}。1916年4月10日在致邓泽如的信中,孙中山再次强调武力的重要作用,“国是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武力。如何创有组织或驾驭原有之师旅,皆须以敢死得之同志为本位,然后坚固不摇,战胜一切”^{[10]89}。孙中山还请邓泽如物色壮勇到日本组成敢死队,加以军事训练,以备他日中下级军官之选拔。1916年5月20日,孙中山在致黄兴函中指出,适逢讨袁之际,“武力之发展,此时尤不容缓”^{[10]93}。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他于中国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受聘为该会名誉会长,前往参观时亲笔题赠‘尚武精神’横匾,并为该会出版的《精武本纪》一书作序”。在序言中孙中山指出,“吾人初不以黠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10]100}从中表现出孙中山对“尚武精神”的肯定。

三、北伐话语下的黄花岗起义纪念:“三民主义”治军思想

第一次祭奠黄花岗烈士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加上时局混乱,孙中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活动被迫中止。为此,孙中山遗憾地表示,“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岗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14]50}。

1921年3月24日,孙中山在黄埔检阅海军陆战队后,发表演说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并以法国大革命中推行的平等、自由、博爱主义取得成功为例教育士兵^{[11]352}。此时,孙中山的军事思想中已经蕴含用“主义”治理军队的要求,但是还没有形成成熟的

理论。

1921年4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粤军第一、二师恳亲会发表演说,提出要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指出“革命主义,是在前清末年便布满了中国的。革命党当时拼命救国,各省牺牲了性命的不知多少。广东更多,黄花岗上的烈士,都是因革命牺牲了的。他们慷慨起义的正气,凡是有良心的人,哪一个不感动,渐渐的那些军人,都感动着对革命表示了同情了。”^{[11]349}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并发表就职宣言,称“誓竭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11]342}。次日,即为黄花岗起义十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亲自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广州各团体学校亦派代表参加。孙中山在祭文中称“昔者胡虏,入此室处,操杖吕兴,惟我与汝,……时惟义师,斩木揭旗,鸱鸢历吻,无枝可依。镇南泥封,黄冈之重,三十三年,落花如梦,……孰为吾济,九州岛之尤,夺门而入,破釜沉舟。苍穹血浴,大堤肉搏,七十二人,成此一局,……今来汝前,墓草芊芊,兴复之责,乃集我肩。白马潮来,生增易逝,黄花春老,应许重开”^{[11]355},表达出沉痛的悼念之情。第二次纪念黄花岗起义,适逢第二次护法战争进行之时,孙中山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与当时的护法运动相联系,赞扬七十二烈士“破釜沉舟”的勇气,并提出“兴复之责,乃集我肩”,以此鼓舞士气。此后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孙中山在治军过程中对军人的精神教育明显加强。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粤滇欢迎大会”发表演说,倡导注重军人教育,尤其是“革命精神教育”。他认为革命精神来自“精神教育”,要向军人灌输精神,然后才“可以为军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14]11}。孙中山强调智、仁、勇军人精神三要素,明确将三者与三民主义相联系,孙中山认为“观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后起,视死如归,即为主义而牺牲也。主义维何?三民主义是也”^{[14]24}。三民主义“为军人之精神所由表现,亦即为军人之仁所由表现”,军人实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于“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14]29}。1921年12月,邹鲁请孙中山为其所辑《黄花岗烈士事略》作序。在序言中,孙中山再次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精神与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联系,赋予新的内涵。孙中山此举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此时孙中山在桂林督师讨贼,面对的恰恰是国内政治纷乱的局面,孙中山对此深感痛惜,“环顾国内,贼氛方

炽,杞梟之像,视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倡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生命以争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则予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予完成此重大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史,可传世而不朽”^{[14]50}。1922年2月7日,孙中山“复电全国各界联合会,告北伐部署初定,届期将督师北伐”^{[14]427}。北伐开始不久,直奉战争爆发,国内局势混乱。4月中旬,孙中山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指出“北伐的目的在于推翻北京政权”^{[14]441}。4月25日,孙中山派徐绍楨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出于宣传的考虑和促进北伐顺利进军的需要,孙中山在其撰写的祭文中首次将黄花岗烈士之牺牲精神与北伐相联系。孙中山写道:“共和肇兴,霍乱未已,民无宁岁,国谁与立。诸烈士喋血殉身,艰难缔造之民国,至今尤在危疑震撼之中,……惟是国家兴亡,吾党之责,背民治贼,势不两立。本大总统率师致讨,未敢苟安,以诸烈士之英灵,至今凛凛犹有生气,秉此以战,幸而得克,则备份忧伤者有限,而精元天合,天人相庆者无穷矣”^{[14]405}。

1922年6月22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在与上海报界人士谈话时提出:“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舆论之力较武力为大,武力始之,舆论完成之,乃有护法结果,而使国民人人咸知共和真理”^{[15]530-531}。说明此时孙中山更加注重从思想上对人民和军队加强引导。1923年,孙中山“命盐运使署按月拨款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及红花岗四烈士墓经费”^{[11]695}。

1924年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加之受苏联和中共的影响,孙中山重新梳理三民主义思想,三民主义思想体系逐步形成。

1924年4月3日,孙中山在给杨庶堪的训令中提出训练民团,要求各县派专员赴各乡施行军事教育,并因势利导,宣传三民主义,以备保护地方及将来出师北伐之需要^{[15]10}。在陆军讲武学校,除了开设军事上应有的学科外,又在每星期请名人演讲国民党革命主义,对于现代思潮、本国情势、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特别注重^{[15]114}。

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后,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给原有的旧思想带来很大冲击,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924年5月2日,孙中山出席岭南大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十三周年纪念会并

发表演说。孙中山高度赞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革命“断头流血,牺牲性命”的志气,指出“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便应该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要学习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习他们的道德观念”^{[15]156}。孙中山又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精神与三民主义思想和当时流行的“新道德”相联系,提出“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许多有本领学问的人。他们舍身救国,视死如归,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就是感受了这种新的潮流”,他希望青年学生“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虽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要步七十二烈士的后尘,竭力去铲除这些防止国家社会中新道德之进步的大障碍,才是黄花节的真纪念”^{[15]157}。孙中山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精神与三民主义及新道德相联系,显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所弘扬者不仅包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精神本身,而且扩大到三民主义及新道德所包含的内容,并希冀在这种扩展之下达到对学生、军人施行精神教育的目的。

同日,广州各界人士二十余万人隆重公祭黄花岗烈士。广州革命政府要员谭平山、李烈钧、廖仲恺、张开儒、柏文蔚、邹鲁、邓泽如、戴季陶、许崇智、程潜、林森、吴铁城等出席公祭仪式。孙中山“派大本营参军长张开儒代为主祭和宣读《祭黄花岗烈士文》,祭文高度赞颂诸烈士‘前仆后继’‘元精贯日’的英雄气概和‘以寡敌众’的牺牲精神”^{[11]900},号召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学习。1924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对韶关各军将校训词中号召将士们学习黄花岗烈士的勇于牺牲的奋斗精神^[16]。

孙中山通过对黄花岗烈士的纪念,号召青年学生和军人学习黄花岗烈士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将黄花岗烈士的牺牲精神和三民主义思想相联系,为向岭南大学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北伐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搭建桥梁,使三民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并取得积极的效果。黄花岗烈士的牺牲精神和三民主义思想的互融正是孙中山用三民主义治军思想的体现。

孙中山对黄花岗烈士的纪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广州民国日报》推出“黄花号”^[17]。1925年3月25日,国民党决议“以阳历三月二十九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18],正式将黄花岗烈士死难纪念作为法定纪念日。1928年国民政府发布《国府令发抚恤黄花岗先烈补充条例案》^[19],对先烈

后裔实行优抚,以慰军心。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革命纪念日简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不仅包括黄花岗起义,还包括在此之前的1895年广州起义、吴越之刺杀五大臣、徐锡麟、秋瑾之死义等内容^[20]。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曾将纪念黄花岗烈士的精神与抵抗日军侵略相联系。

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在不同时期根据革

命斗争的需要分别赋予黄花岗起义不同的时代内涵,以此激励战士浴血奋战,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孙中山晚年又将黄花岗烈士精神与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以此建构国民党治军的重要精神要素,鼓舞将士斗志,由此推动北伐的进程。这种治军方式相较以往湘军、淮军以地域、血缘的划分来治理军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促进中国军队步入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533-534.
- [2] 赵洪宝.孙中山军事教育思想与实践[J].军事历史,1993(1):8.
- [3] 宗成康.论孙中山的一地起义各地响应的武装起义战略[J].史学月刊,1990(2):56.
- [4] 彭平一,夏明涛.孙中山的战争观[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2):25.
- [5] 吴学文.孙中山与黄花岗[J].伊利教育学院学报,2006(3):25.
- [6] 李恭忠,黄龙云.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 [7]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 邹鲁.广东三月二十九革命史[M].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6.
- [9] 刘滴.试析孙中山1911年的筹款活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2):148.
- [10] 黄彦,萧润君.对军人及军事演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J].安徽史学,2013(1).
- [1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390.
- [13] 黄彦,萧润君.革命方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8.
- [1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 国庆日大元帅对韶关各军将校训词[N].广州民国日报.1924-11-12.
- [17] 黄花号[N].广州民国日报,1924-05-02.
- [18] 决议黄花岗纪念日[N].(上海)民国日报,1925-03-26.
- [19] 国府令发抚恤黄花岗先烈补充条例案[N].广东省政府周报,1928:50-51.
- [20]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固定节日的历史考察[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08:54-56.

(责任编辑:董应龙)